

灯 塔 工 的 值 班 室

La chambre de veille

François Hartog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著 赵飒 译

FRANÇOIS HARTOG
LA CHAMBRE DE VEILLE

灯塔工的值班室

[法]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著

赵飒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灯塔工的值班室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著；
赵飒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8
ISBN 978-7-5086-9953-0

I. ①灯… II. ①弗… ②赵…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5231号

La chambre de veille by François Hartog
Copyright ©Editions Flammarion, Paris,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灯塔工的值班室

著 者：〔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译 者：赵飒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2.75 字 数：113千字
版 次：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8-8253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9953-0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II\ 见识城邦

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

献给托马

序 言

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趁圣诞假期去韦桑岛（île d'Ouessant）上住过几次。那里有一个面朝朗波勒湾（baie de Lampaul）的小旅馆，名叫“安娜公爵夫人”。从我住的房间可以看到拉于芒（la Jument）的灯塔，塔上的红灯每十五秒闪烁一次，为福隆维尔（Fromveur）航道提供航标。想到岛上去的话，先要乘夜间的火车到达布雷斯特（Brest），步行至商业港口，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登上每天停靠勒孔凯（Le Conquet）、莫莱讷岛（île de Molène）和韦桑的“埃内兹·厄萨（Enez Eussa）号”客轮。船驶离泊位时，灯塔的灯会灭掉。太阳有时在一片氤氲中升起，有时则闪耀着冬日的冷光，锐气逼人。在这个房间里，我保护着自己的孤独，写新小说风格的作品，或者说写着玩，也时常对灯塔工这个职业或多或少产生一些向往。我以前听说索邦大学有个文学专业的年轻人当了灯塔工，并被分配到坐落于塞恩路上岩石群边的阿尔芒（Armen）灯塔，离这儿不算太远。他就是让-皮埃尔·亚伯拉罕（Jean-Pierre Abraham）。196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阿尔芒》（Armen）的书，与其说这是一部灯塔生活编年史，不如说是一位作家关于光与影的沉思录，这位作家所追寻的是那些“在人们的目光中熠熠

生辉”的词语。

要知道，在灯塔里，探照灯的正下方有一个小房间，叫作值班室。值班的灯塔工在完成日常检查工作后，就在那里值班，时刻注意让灯光保持“明亮”。在这个没有门窗的圆形空间里，有一张操作台，一把扶手椅，一部在固定休息时间里用来消遣的收音机，几本著作，以及一本值班日志。每过一刻钟，他就要在这本证明性的册子上记下观察到的一切有用信息：天气、海面状况、雾气状况、其他灯光装置的可见度、船只经过的情况、储备情况、养护工作、意外、事故、灯塔工介入处理的情况，等等。总之，在这个房间里，什么也看不到，却又什么都能看到。在那里，夜复一夜，知识逐渐累积，朴实简练的笔触下也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灯塔的学问，灯塔工关于外部世界的学问，还有关于灯塔本身的学问（灯塔工的值班日志）。

在具有一定规模的舰船上，也有一个值班室或者海图室，位于舰桥后方，里面有海图桌、成套的海图以及所有与航行有关的文件和须知。航线的选择和航向的改变都是在那里决定的；也是在那里，通过罗经或者六分仪得出的观测结果会成为地图上舰船的方位；还是在那里，由值班的军官来填写航海日志。那里同样出现了什么也看不到却又什么都能看到的悖论。人们会把从舰桥上看到的東西在海图桌上进行分辨，得到一个名字和一些信息后，海图桌上便会显示出接下来将在舰桥上看到的東西。情况通常如此，但也不一定。

我既没有成为灯塔工，也没有成为水手，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成了一名历史学者。我曾经参观过海上的灯塔，也登上过几艘货轮。最终我明白了，我的书房，连同里面的书柜、资料和各种笔记，就是我的值班室。这也是我想给这部访谈录起的名字。同样，在书房的空間里，

我们看到的和看不到的东西进行着交流。那里有我们想看到的、以为自己看到的以及努力想让别人看到的東西，通常还有那些出于某种原因被我们遗忘的东西。

海上灯塔已经全部实现自动化了，灯塔工不复存在，值班室也被搁置。远洋航行在 GPS 定位系统的普及和各种软件的使用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我们随时都能获取航船的精确位置，知道船在哪里以及周边还有哪些航船（它们的名字、武器装备情况，等等）。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差距已今非昔比，视野的确定也不再需要或者不那么需要舰桥和值班室之间的频繁互动——那些构成海上值班日常工作的互动：喜悦，还有间或出现的焦虑。

至于我自己，我还流连在我的值班室里，继续值我的班——哪怕再值上一阵子也好。

F. H.

目 录

序 言 *i*

选择古希腊，就等于退出主流 001

那些启发过我的人 029

我把时间花在突破限制上 049

我应该看到事物的两面，并保持中立 083

站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边界上 109

如今，我们再也不知如何将过去、当下和未来联系在一起 131

历史学家是时间的监视者 161

致 谢 181

引文书目 182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研究文选 187

选择古希腊，就等于退出主流

您目前如何看待自己这份历史学家的工作？或者说您是如何“值班”的呢？

谈到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就是尝试理解世界的那些人的工作，而不是特指历史学家的工作时，我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三种形象。第一个形象是船长。我把理论学家比作船长，他决定目的地、调整航向、规划航线；海图室是他的地盘。所有伟大的思想发现者或冒险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属于这个类型，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大概就是黑格尔了，他是船长中的船长。再往早说，那就要数柏拉图了。

如果举两个离我们更近一些的例子，其中之一当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不是 1935 年以真正意义上的“发现者”身份在巴西高原上开始接触人种学的那个他，而是在邂逅语言学后成为结构主义理论学家，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深入那场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冒险的那个他。另一个例子是作为文献学家而非哲学家的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这位“航海家”孤身一人投入到他所说的“超历史”当中，在被印欧语系浸没的巨大暗礁群里摸索前行；一系列语言从印欧语系发展出来，它们的使用者曾

将这一语系视为“思想的宝库与载体”。在比较神话学的研究过程中，杜梅齐尔逐渐得出了一种结论，并将之命名为“三元体系”：王者功能、战士功能和生产者功能。这份名单上远不止这两个名字。

20 世纪 60 年代末，过度理论化的风潮突然转向，成了对理论的全盘否定。很多人把理论从船上扔了下去，首当其冲的就是马克思理论。人们陷入了湍流、潮涌和环流之中，放弃了策略和方法——所谓方法，毕竟只是地图上标出的路线而已。良机（kairos）这一概念——即刹那的飞跃——受到追捧，诡辩派也死灰复燃，压倒了逻辑派。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此出现：他嗅着风向，在舰桥里走来走去，对海图室充满怀疑，甚至干脆弃之不用，极尽过分和愚蠢之能事，这种姿态有时便伴随着悲剧。哲学一开始被视为一种生活的艺术，晚年的福柯将其定义为“对自我的关注”。

最后，第三种形象出现了：这群人既不是沉思的理论家，也不是鼻孔朝天、无所事事的家伙，而是处在这两者之间的人。作为值班人，他们不停地往返于舰桥和海图室。历史学家的位置就在这里。难以想象他们会完全醉心于纯粹的理论或者只相信岁月的泡沫（事件，只有事件）。这样的例子也有几个：希罗多德这种远的就不说了，我想到的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他的历史时间三分法（短时段，即事件时段；中时段，即情势时段；长时段，即结构时段），他是这群人里的代表人物。他建立的模型将经验性研究同某种理论维度结合了起来。他的“长时段”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工具，而这种工具又正巧“抓住”了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情势，或者说与之形成了共鸣：这也是它获得成功的原因。另一方面，20 世纪 60 年代初由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构思出来的希腊城邦模型也给了我

同样的感觉；还有 20 世纪 80 年代由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的“记忆之场”这一概念，在我看来，它也属于这种中间之物。“记忆之场”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工具，也不是一个纯理论性的命题，因此受到了广泛欢迎。我们之后会再提到这几个例子。

很明显，我所向往的形象，就是第三种。我通过这种方式成为我儿时梦想成为的水手，当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手。

所以，在您看来，第三种立场必然就是历史学家的立场咯？

是的，但是有两点要说明一下。这种立场绝不是专属于历史学家的——所有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都可以属于这一类。而在这些专业领域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的。你必须有成为历史学家的意愿和行动。

不过，自 19 世纪末以来，历史学家都只是擅长某个特定时期的研究，然而您在研究了古希腊以后，又涉足了各种不同的时期、概念和对象。您如何定义您自己的研究领域？

年复一年，一个研究领域逐渐形成，最终变为“我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划分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我的”研究领域只代表我的研究历程，完全不是里程碑或者产权一类的东西。简单来说，我的研究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古代世界的文化史，受到了让-皮埃尔·韦尔南的历史人类学的启发。这个领域与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和梅斯大学教授希腊史的经历有直接关系。我把自己那篇关于古希腊人和蛮族，进而涉及相异性的论

文中所讨论过的问题做了进一步延伸，随后，通过各种巡回者的形象、边界人物（尤利西斯、阿纳卡西斯、阿波罗尼奥斯）、地点（埃及、阿卡迪亚）和时刻（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相遇的时刻），我的研究最终聚焦在文化边界的问题上。这个研究思路最终在 1996 年促成了一本名为《尤利西斯的记忆：古希腊的边界叙事》（*Mémoire d'Ulysse. Récits sur la frontière en Grèce ancienne*）的作品。

第二个领域是历史编纂学，也就是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古代的研究以及如何探讨古代习俗的历史，在这方面，我循了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aldo Momigliano）和皮埃尔·维达尔-纳凯（Pierre Vidal-Naquet）的足迹；另一方面是我对由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开启的“历史书写”的思考。1980 年，我的第一本书《希罗多德的镜子》（*Le Miroir d'Hérodote*）已经处在了这几个研究方向的交叉点；而我关于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的《古代城邦》（*La Cité antique*）还有他的文章的研究则在 1988 年促成了《十九世纪与历史学》（*Le XIX^e Siècle et l'Histoire*）的出版，这也是我第一次冒险涉足现代历史编纂学。

随着记忆浪潮的涌现和柏林墙的倒塌，对时间的思考出现了，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的社会里，未来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也就不那么有驱动力了。第三个领域也给我此前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发，这体现在我们后面会谈到的《古代人，现代人，野蛮人》（*Anciens, Modernes, Sauvages*）和《历史的显现》（*Évidence de l'histoire*）这两本书中。

这些研究课题各不相同，而您关于希罗多德的论文——也就是日

后的《希罗多德的镜子》却证明它们有着共同的根源。

其实最初在选择希罗多德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深入研究的可能了，因为我意识到，研究希罗多德可以带出一连串的问题——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具体都有哪些问题。

希罗多德首先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从一个人的作品出发，探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这也是审视历史书写方式的一种途径，即以一种新的视角看待事物，这种视角不同于此前一直将修昔底德这位被19世纪公认的正宗历史学家奉为经典的主流视角。我当时想指出的一点是，人们一直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希罗多德，但他并不仅仅是修昔底德口中那个尚显“天真”的先驱。

与第一个研究课题一同出现的还有相异性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很热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希罗多德同样是一个有优势的切入点，这体现在他描述其他人，也就是非古希腊人的方式上面。我感兴趣的是他对斯基泰人的看法。作为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古希腊人的反面，因为在后者看来，只有城邦生活才是好生活。然而，希罗多德并没有将这些游牧者单纯地记述为负面的、一无所有的人类（正如16世纪那些以无信仰、无法制、无国王著称的野蛮人），而是赋予了他们一种正面的特质，也就是那种无法捕捉、无法触及的特质：没有道路（poros）能通向他们，但他们能够利用这一点躲避征服者。这正是波斯侵略者的写照，他们永远无法干脆利落地打一场输赢一目了然的胜仗，而且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他们最终不得不匆忙班师回朝。在希罗多德看来，日后的希波战争中，波斯大军以失败告终，这正是斯基泰人远征的重演。很久以后，托尔斯